

中华文化典籍精华选读系列

青 少 年 读 本

主
编：郭莹

五经 选 读

李似珍
编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华文化典籍精华选读系列

编委会 冯芳华 周积明 陆才坚
郭莹 何晓明 钟年

(青少年读本)

五经选读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组编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经》选读/李似珍编著. -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中华文化典籍精华选读系列/郭莹主编)

青少年读本

ISBN 7-5351-2620-0

I. 五… II. 李… III. 经学-青少年读物 IV. Z1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7494 号

出 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83625580

经销:新 华 书 店

印刷:武汉市新华印刷厂

(430200·江夏区古驿道)

开本:787mm×1092mm 1/32

4 插页 6.5 印张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18 千字

印数:1-3 000

ISBN 7-5351-2620-0/G·2133

定价:12.5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序

传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虽然人们总是把它作为“现代性”的对立物来看待，但却无法割断与它的血肉联系。即使侨居国外多年者，如张爱玲，我们也仍然可以从他们的呼吸中嗅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氣息。

是的，这就是传统，一个民族无法割离的生命之根。无论它在现代社会遇到多么强劲的挑战，无论人们如何对它实行“现代性的转换”，它始终是不动声色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影响着我们的生命方式。而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谓“中国的智慧”，其根底必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精髓。

面对这样的文化必然，我们怎能对传统漠然？无论是为了从传统文化中吸收古老的智慧，还是要解决“我们是什么？我们从何处来？我们的现在是什么？我们最终如何生存”这样的终极性问题，我们都应该去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而要做到这一点，重要途径之一便是读一些经典性的中



华文化典籍。在这些典籍中,你将会发现,其中的很多思想,不仅曾经深刻地影响过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而且仍然在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

《中华文化典籍精华选读系列》(青少年读本)就是为如上文化目标而设计的,它的组编者是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该所在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化史研究中,不仅高度注重学术创新与开拓,出版了《中华文化史》、《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知识分子命运和中国现代化进程》、《文化之道》等学术专著,而且还十分注意文化的传播与普及,组织编撰和出版了《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国古都》、《中国传统文化浅说》、《中国智慧集粹丛书》、《中国古典小说谈丛》、《中国社会生活谈丛》等学术性和普及性相结合的著作。《中华文化典籍精华选读系列》(青少年读本)正是后一系列的续作。本书系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精选中华文化典籍,各书选取代表性篇章,加以导读。所依版本力求具有权威性、准确性;选编内容具有思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相结合的特点。我们热诚希望这套丛书能为青少年朋友以及具有一般文化程度的读者开启一扇通往中华文化瑰丽殿堂的门扉。

导 言

(一)

“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这五部著作。其中《诗经》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周朝至春秋时代，它收集了来自民间及宫廷的各种体裁的诗篇，据说这些诗篇都曾配上乐曲为天子演唱，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尚书》记载了距今四千年至两千年间的虞、夏、商、周的史实，是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其中《尧典》、《皋陶谟》等篇，甚至反映了更为远古的尧、舜时代的历史事迹。《周易》因其成书于周代而得名，《易》有变易、简易、不易等义，在这里特指一种由著草策数以定象的占卜方法。它的形成文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初期。诠释与阐发正文的《易传》部分，也大致在战国时期已经成文。《周易》不仅集中了当时人们所积累的许多生活体验与人生经验，在思维方式上也具有相当的逻辑性，所以被认为是我国最早、最为完善的哲理典籍。《礼记》所记载的是先秦时期社会道德准则与人际交往礼仪范式，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礼节仪式的具体操

演程序,故能使人得到较为具体与明确的印象。《春秋》则是我
国最早的一部完整、详备的编年史。

“五经”各书从文学、历史、哲学等角度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最高水平,所以自春秋战国时期起,就被学府采纳,作为较高层次的教学课本。孔子创办私学,选择的教材就是以上述五本书为骨干的。据说孔子不仅将“五经”引入教学,还对它们作过深入的研究。当时的书籍多用漆写在竹简上,以皮带串订,称作“韦编”。史书上记载孔子因不断翻检《周易》,竟使串订的皮带三次断裂,由此有“韦编三绝”的成语留传至今。在熟读原著的基础上,孔子亲自对这些书籍中所出现的错误及颠倒、重复的文字加以删修、增补、纠正,从而使这些书籍在内容上臻于完整,但也因此使它带上了明显的儒家学派特色。

将《诗》、《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并称为“五经”的提法,始于汉代。汉室开国皇帝刘邦的谋士陆贾在所著《新书》中曾说:“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道基》)这里的后圣是指孔子,但孔子本人未有“五经”的说法。在中国古代,“经”是用来专指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而其他的书籍则只能冠之以子、集之类。“五经”的提法出现后;各书在名称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动,《诗》被称作《诗经》,《尚书》名之为《书经》,《周易》则被称为《易经》,等等。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为此,他特在官方学府中设置“五经”博士职位,专门负责对学生进行“五经”的讲授,这样“五经”作为当时社会公认的儒家经典的身份便被确定下来。在漫长的

中国封建社会中，“五经”一直未失去过它的官方地位，不过以后的学府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增添（如增补了《仪礼》、《周礼》、《孝经》、《论语》等），或加以重新组合，逐渐发展成“六经”、“七经”、“九经”、“十经”、“十一经”、“十二经”，到宋代之后定为“十三经”。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五经”中的内容被定为考试命题的重要依据，从此，它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

“五经”各书的体裁与结构各具特色，其中《诗经》全书分风、雅、颂三大部分，风按地域分为十五国风，共收诗一百六十篇；雅分小雅七十四篇和大雅三十一篇，共一百零五篇；颂分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四十篇。总计收诗三百零五篇，古人举其成数而有“诗三百篇”的说法。风、雅、颂的区别在于：《风》从音乐方面看，是具有地方特点的土风歌谣，内容多反映当地风俗，有的则揭露与讽刺当时的一些腐败、黑暗现象；《雅》是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多为反映政治状况与历史事件，一般在宫廷宴会中演唱；《颂》多为歌颂先公先王的诗，是用于祭祀神灵、祖先的宗庙乐歌，其中也提供了关于周的兴起及其经济制度、生产状况的资料。《风》的采集地域大致分布在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湖北等地。

诗篇的形式以一句四字为主，并普遍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其中以赋运用得最为广泛；所谓赋，就是通过对物象的捕捉与描写，来表达诗人情感的方法；比，就是修辞手法

中的比喻；所谓兴，是指一首诗或一章诗先以对鸟兽草木的描述来开头，然后再进入正题。由于《诗经》中有对各种文学表现技巧的运用，所以它的篇章描写生动，语言朴素优美，音节自然和谐，富有艺术感染力。

《尚书》的记载分记事与记言两类，在所记录的诸多言论中，保存着上古时代的一些政治思想。比如周王朝决策人物周公一再强调的“敬德保民”，就是提醒统治者应注意自身修养，遵循传统道德，重视民意，等等。另外从中也可反映出我国自氏族社会末期到阶级社会初期的社会概貌，如《尧典》着重记载了尧和舜的事迹，以及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制度解体的史实；《皋陶谟》的中心议题是关于治国的方略；夏书中的《禹贡》，反映了大禹治理洪水的经历；《甘誓》文字简短，但所记录的却是一次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转变时刻的重大战争事件；《盘庚》等篇的内容涉及到商王朝的起始与发展；《周书》中各篇，则几乎是对周王朝由建立而巩固而兴盛全过程的跟踪报道。这些篇章提供了政治、思想、宗教、法律、地理、历法、军事等多方面的宝贵文献，为我们研究奴隶社会的历史提供了依据。

就《尚书》的内容而言，可粗略分为典、训诂、誓、命几类。典记载古代的典章制度，训诂记载训诫诰令，誓记录君王、诸侯的誓词，命则是指君王任命官员、赏赐诸侯的册命等。它的各篇题目取法不一，有取自全篇宗旨的总概括，如《禹贡》意为禹的功绩，《酒诰》是指周公严厉告诫康叔戒酒之词；有取自篇中主要发言人的名字或是名字与发言体式的结合，如《汤誓》是指汤这个人所作的誓即战争动员令；也

有取自文章开头一句，如《盘庚》、《君奭》即是。这些命题方式，也为后世所效法。

《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文由“——”两类构成的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组成；《传》分《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七种十篇，合称“十翼”，是解释经文部分的著作。旧传上古时代的伏羲开始画出八卦，周文王将其排演重叠而构成六十四卦，孔子作《易传》。近代学者多数认为《易经》成书于文王之后，《易传》也不是孔子所作，实际上它们都是文化长期积累的产物。

《易经》是对通过卜筮所得到的卦象作出解释的文字。它首先列出八卦，每卦由“——”两种符号（前者称为阳爻，后者称为阴爻）按不同顺序排列的三爻组合而成，名称是乾三、坤三、震三、巽三、坎三、离三、艮三、兑三，分别象征天、地、雷、山、火、水、泽、风八种自然现象。然后，再由八卦两两重叠，每卦六爻，组成六十四卦，按阴阳渐盛或衰的渐变顺序进行排列。《易经》对六十四卦的释文分卦画、卦辞与爻辞三个部分，对每一卦的解释都是首先列出卦画；其次以文字解释此卦的总体含义，这叫卦辞；最后再由下而上，解释每一爻的意思，这部分是爻辞。一般来说，卦辞、爻辞的解释以爻的阴阳为最初出发点，如以—代表阳、刚、男、君、强、奇数等，象征积极的事物；--代表阴、柔、女、臣、弱、偶数等，象征消极的事物；然后再在这一基本属性含义的基础上，加以引申与发挥。

卦辞、爻辞的解释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制相克的矛盾，

《易传》中的《彖》和《象》便从不同角度对这些矛盾加以分解,从而作出最后的物象人事凶吉的判定。另外,关于卦象制定的意义、原则及其源起等方面,《易经》中缺乏必要说明的,也由《易传》加以补充。其中《易传》中的《系辞》,是对《易经》基本意义、原理、功用、起源等方面所作的总体说明;《说卦》主要解释最原始的八卦的性质及其象征意义;《序卦》说明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杂卦》错综地解说各卦的含义;《文言》则是对《易经》中最重要的乾、坤两卦所作的专题解释。在两汉时代,《易经》原与《易传》各自单独刊行,但到了魏晋时期则成为合刊通行的样式。流传至今的《十三经注疏》版本中,《周易》已将《易传》中的《彖》、《象》、《文言》各篇分列于《易经》各卦之下,而《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则分章节置之于《易经》全文之后。这也是我们这本导读所采取的样式。

《周易》中各卦,经过这样多重侧面的爬梳整理,已建立起自身特有的图式体系。它运用阴阳消长的渐变次序,把自然界中的多种物质现象与人类生存的社会内容纳入其框架之中,使人们意识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并非截然无关,它们有着错综复杂、隐显交替的有机联系,这种关联体现着世界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性。这一思想,体现着对事物的发展、对立面相互联系与转化等朴素辩证法的认识萌芽,体现着我国上古时代抽象思维能力所达到的高度。

“春秋”一词,古代可代指四季,后又引申为岁月、时代、古代史书等义,所以《春秋》的题名就是“国史记载”的意思。中国古代曾把各国国史都统称为“春秋”,但在当时的许多

国史中,经过整理、保存流传下来的,只有鲁国的《春秋》,它的保留可能与孔子的参与删节、整理有关。但汉时人因此认为《春秋》的作者就是孔子,这种推测可能过于武断,应当说它的真正作者还是鲁国的史官。现存的《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计二百四十二年。它以年、月、日为排列顺序,记录了当时一些国家大事的纲领,所以有点像官方历史档案性质。由于记事简略,每事最多不过记录十几个字,有些内容未免过于朦胧难猜。为了使其中的历史再现真相,战国时出现了一些解释性的传说。后来这些传说形成文字,即成《左传》、《公羊》、《穀梁》三本书,后人称为“三传”。

《公羊传》以前认为作者为战国时的公羊高。据汉代学者何休等人考证,认为其中内容在先秦时只是一些口说流传,到了汉代才编写成文。据说它的流传过程为由孔子弟子子夏传给公羊高,再由公羊高子孙继续口耳相传,直到汉景帝时才由公羊寿与胡毋生(子都)写定在竹帛上。《穀梁传》据晋代范宁、唐代杨士勋考证,认为起初也有一个口耳相传的过程,也是由孔子弟子子夏起始,在传到穀梁俟时写成文字。成书时间也在汉代,稍晚于《公羊传》。《公羊传》和《穀梁传》都较着重于阐释《春秋》行文中的词义与所发生事件的政治、思想意义,而对史实本身补充得较少。这种注重从义理角度对所发生史实的评论,在风格上突出了汉时今文经学派喜欢发挥“微言大义”的特点。当然在具体观点与解说上,两书还是有其不同看法的。

《左传》一书的作者据说是先秦时鲁国太史左丘明。据

司马迁《史记》介绍，左氏是个盲人，他大约生活于孔子同时代，出身贵族阶层，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近代以后的学者多认为《左传》的作者或者是历任鲁国的史官，他们负责记录对于政府来说有重要意义的公私诸事，以鲁国为主线，兼顾诸侯列国的大事。《左传》的解释包括记事与评论两个方面，但偏重于史实的部分。它的记载年代虽然同起于鲁隐公元年，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原文多出十七年，而叙事则更延至于悼公十四年（前454年）为止，甚至有些战国时的事情也被编入。另外从《左传》依据的纪年方式来看，也与《春秋》不完全统一，可见它原本是独立于《春秋》的史书，经后人改编才与《春秋》相混合。

《春秋》列入汉代学府教材“五经”之时，除了正文，还附有《公羊传》与《穀梁传》这两个释本。内容排列上，《春秋》以鲁国国君的更替为顺序，分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各卷，各部分不列标题，仅以历史年代前后为依据。《公羊》、《穀梁》两传中的内容则分散列于《春秋》正文各年月条文之下。《左传》起初只在民间学者中私相传习，不被汉代学府所承认。后几经争论，直至东汉章帝（76—88）时才被列入官方学府。列入方式与《公羊》、《穀梁》相同，也是内容分散后列于各章年月条文之下。“三传”虽在列入“五经”时采取了拆散分列的方式，但到唐代学府教材发展为“九经”、“十经”、“十一经”、“十二经”，乃至“十三经”之后，它们便被独立出来，题名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并单独刊行成书。考虑到本书的选材源自“五经”，故《春秋》本的内容

被认为是囊括“三传”的总称。

《春秋》的内容涉及春秋时诸侯国的政治活动、战争状况、会盟朝聘、祭祀、婚丧等仪礼及各种自然灾害，各传在释文中则涉及了一些人物的事迹及其思想，其中许多内容可独立成篇，可读性较强。从记叙方法来看，《春秋》作者已具有高度的组织材料能力，将上至两百多年中发生在一百四五十个国家之间的事情，按年代时日排列得有条不紊。有些事情起因与发展、结果之间相隔好几年，仍能理清来龙去脉，具有记叙上的严密性。特别是《左传》在描写诸如战争、会盟、政治决策等错综复杂场面时，能够将一些远因、近因、谋略策划、现场气势及善后结果等写得层次分明、有声有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左传》等注本还擅长刻画人物性格，所写人物口吻语气逼真，性格分明，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平。

《礼记》一般是指《小戴礼记》，即由西汉学者戴圣编纂的礼学文献选本。“礼”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在奴隶社会夏、商、周各个时代，统治者都曾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下令有关人员加以制定。三朝之礼因革相沿，到周朝末年已比较完善。相传孔子十分注重“礼”的制度，他祖述周王朝的礼数，传授于他的弟子。后学在孔子影响下阐述礼义，写了大量有关的论文，到汉代有人将它们结集成书，命名为《礼记》，录有一百三十篇。

汉宣帝（前73—前49）时，江都王太傅戴德将《礼记》作了删改，去繁芜而存精华，选定为八十五篇。世称《大戴礼记》。戴胜的侄子戴圣又从《大戴礼记》中选取四十六篇，称《小戴礼

记》。汉末学者马融在传授《小戴礼记》中,加入《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遂有四十九篇。后东汉郑玄为四十九篇本《礼记》作注,此注本被列入官方学府,作为“五经”中《礼记》的定本,此后《礼记》便以四十九篇本的面目流传于世。

《礼记》维护建立于宗法与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规定了与它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同时也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确定了人们行为的道德准则,所以受到自汉代以来的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一些执政者在思考政治体制建构及其礼仪范式时,往往要参考《礼记》中的相关内容。它也为朝廷制定方针政策及道德伦理标准提供了理论与实际的依据。

《礼记》的内容十分驳杂,其篇目编次往往没有太多的根据,古人曾就其中所含宗旨而加以分类,认为它们分别涉及政治制度、丧礼、祭祀程序以及音乐、教育、为人处世态度等内容。除了篇章的无序,《礼记》在各篇内容的安排上也不太注意前后的连贯性。四十九篇中,除少数篇章外,大部分没有突出的中心思想,而且同一篇的前后节之间也很少有逻辑性,往往自成段落,表达一个与上下文都不相关的意思。如《曲礼》,其上篇六十一小节,下篇四十三小节,总计一百零四小节,就记载了一百零四条互不相关的内容。《礼记》中有些篇章虽有相对集中的内容,侧重于某一方面,但所记亦多杂乱而无条理。如《檀弓》上下篇总计二百一十八节,主要是记丧礼或丧事的,而每节各有独立的内容,互不相关。为此,本书关于《礼记》篇章的导读,采取了截取片断的方式,而不像在“五经”中其他各本选段中所做的那样,尽

可能保持原文的完整。

《礼记》中多数篇章的命名,沿袭了《尚书》的传统,或根据篇中所记主要内容或性质,或取篇首或首句中若干字,也有仅据首节或篇中部分内容命名的。因篇章本身的内容缺乏系统性,往往不能完全概括出其实际要领。这也是阅读《礼记》时所应注意的。

《礼记》中四十九篇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又属于杂记体裁性质,因此各篇之间矛盾牴牾之处甚多。比如同样介绍祭天的礼仪,《礼器》篇中说只要清扫出干净的地方就可以祭拜,不必专设祭坛;《祭法》篇中却说应设立祭坛并在坛上架柴点火。诸如此类的情况可谓触目皆是,至于《礼记》所记与其他典籍的不合之处更是不胜枚举。我们在阅读这些篇章时,一般只要求了解大致的含义,而不必去钻牛角尖,断定其中各说法的对错与是非。

(三)

中国古籍大都年代久远,而成书于先秦时期的“五经”诸书,又大都经过秦王朝“焚书坑儒”的破坏,所以其原书多近乎失传。现存本子,多是汉初从民间搜集来的。由于其中有些是秦时焚书时冒险保留下来的幸存本,有些则是根据一些学者的记忆、背诵所记录下来的,所以在书写的文字上有古文(先秦时流行的蝌蚪文)与今文(汉时通行的篆体字)之分,内容也有出入。于是在汉武帝确定“五经”文本时,出现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汉武帝后,“五经”的各本大致经校正、修订后被确定下来,以后便由官方将这些内容刻上石碑,立于太

学门外,以供学者核对。自此之后,“五经”在文字的保存与核对方面较其他书籍来得问题少些。本书的原文引自由清代阮元主持校刻、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的《十三经注疏》本。此本所据原文为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所刻、置于北京国子监的《十三经》碑文。这些石碑至今仍在北京保存。

“五经”各书形成于二千多年前,在漫长时期中又经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与保护,对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格的深层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想了解我们的祖先、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特征,就必须去认真地阅读与体味“五经”等古籍的内涵,它是我们了解先辈思想脉络的不可逾越的中间环节。值得指出的是,“五经”毕竟是从生活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人们经历中所概括出的思想,它们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些社会时代的烙印,有些思想观念已与现在的时代格格不入。另外,这些书籍中也留有一些神学迷信的唯心主义糟粕,比如《周易》就是一本依托于卜筮的书籍,具有巫术迷信的明显特征,这些成分不仅为东汉末年泛滥神学的弥漫开了先河,也在以后各个时代遗害深重。我们在阅读“五经”时,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应具有一定的识别与抵御能力,不能被它们牵着鼻子走。

《礼记·儒行》中有段话说:“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去除这段话里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儒家色彩,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勤奋学习,以期见用于当世、欲为现实社会作出贡献的学子形象。这也是我们今天肯花费大力气去啃“五经”这般艰深古籍的动力所在吧!